

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BY
IDO OREN

美国 and 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美] 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王义桅
译

东
方
编
译
丛
书

译



第 1 卷
第 1 期

文科和理科的区分

——兼论文科与理科的交叉

王德胜 著

· 1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BY
IDO OREN

美国 and 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美] 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王义桅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 and 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美) 奥伦(Oren, I.) 著; 唐小松, 王义桅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Our Enemies And Us

ISBN 7-208-05275-1

I. 美... II. ①奥... ②唐... ③王... III. 政治学
—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875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东方编译所译丛 ·

美国 and 美国的敌人

——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

[美] 伊多·奥伦 著

唐小松 王义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17,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 7 - 208 - 05275 - 1/D · 916

定价 20.00 元

中文版前言

19世纪,成千上万的美 国研究生蜂拥至德国,当时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几乎所有学院的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的奠基人都到德国留过学。回国后,这些学者试图把德国研究性大学的方法移植到美国本土。他们对德国的学术顶礼膜拜,并要求其学生掌握德语。

20世纪,美国两次打败德国,继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和学术大国。英语成了学术界的通用语,美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吸引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研究生。我也是这些外国学生中的一员,1983年从以色列来到纽约攻读政治学。

我进入的这门专业叫政治学,而非美国政治学。它理应是一门客观的、普适性的学科,不应理会马克斯·韦伯的告诫:社会科学知识“总是来自特定观点的知识”。在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和随后的数年里,我的研究领域处在该学科的主流范畴,我毫无疑问地接受政治学是一门客观科学的观点。确实,在我接受的教育中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暗示这一观点会(更不必说应该)受到挑战。

后来,由于我在本书原序中所说的原因,我开始质疑我的专业的客观性。这部书就是我知识转型的产物。在该书中,我试

图展现美国政治学史与美国外交关系史之间的系统关系。我要指出,政治学家对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斯大林苏联的描述在这些政权成为美国的敌人后都变得黯淡无光了。我同时还要指出,美国与这些政权的冲突引发了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国自身描述的重大转变,他们往往夸大美国与其敌人的差异。此外,我还引用大量素材证明本学科领域的重要人物与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间存在亲密的关系,并追踪这些关系如何成为了重大的研究项目。基于这些发现,我还指出,政治学是以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不是一门客观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其潜在而未被承认的理想是美国。我希望这一观点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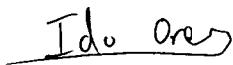
许多美国和中国分析家预言,21世纪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其中一些分析家还预料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日益挑战美国的霸权。

如今,在研究我过去的专业讲义时,我不断幻想未来,可结果一直带有大量诸如如此的痕迹。现在分别预测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兴衰可能也是错误的。但是,假如这些设想得以实现,那么20世纪的美国的经历就会表明,中国全球影响的上升会像经济和军事一样表现在学术领域。将来,越来越多的杰出科学著述可能来自中国。中国的大学即使不超过也会与美国竞相争夺,成为海外学子的磁场。到时中国可能成为全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也会愈来愈主张独立于美国,就像20世纪的美国政治学家疏远德国的国家科学(Staatswissenschaft)一样。

假如中国的确成为世界顶尖的政治学研究国家,那么中国的政治学亦将产生美国那种傲慢感。中国的政治学家将设法把他们的学科描述为一种真正客观、具有普世效应的知识体,并可

能把我这部著作当作一个迹象来证明惟独美国的政治学才被标识为国家观点。不过,我希望他们抵挡这一诱惑,希望中国的政治学比它的美国对手更多一份知性上的卑微,更敢于反省,更清醒正视韦伯的警告:社会科学知识“总是来自特定观点的知识”。

伊多·奥伦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Ido Ore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with a horizontal line underneath the name.

2003年11月26日

英文版前言

十年前,我对军备竞赛(属主流政治学的实体和认识论研究范围)进行数学与统计学研究。我把研究结果发表在一些专业期刊上,并一直为这一工作的质量感到得意。但是,即便粗略地浏览一下该书,就会看出我的知识视野有了很大的变化。这部书对我进入政治学的前提提出了质疑。这种方向的改变是如何出现的呢?

冷战结束后,先前对一度流行的军备竞赛主题的学术兴趣消失了。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和民主在世界大张旗鼓地传播,许多学者被“民主和平”的前景激起了兴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国家彼此不战争的假设——几年前还没有产生多少反响——被广泛接受。它得到了大量统计分析的证明,而且克林顿政府援引它作为其“民主化”的外交政策的合理依据。尽管我怀疑国家间和平是由它们政权之间共有的民主属性来提升的这一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国家间关系的统计学研究在技术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对这些研究的批评必须更多地建立在一种基点上,而不是它们自己的科学根基之上。

鉴于此,我脑海里萌生了一个疑问:威尔逊为何不是在1917年他宣布战争以“维护世界民主安全”的那一刻而是二三十年前认识德意志帝国呢?威尔逊的遗产明显受到民主和平论

的支持者的拥护,我想,如果我们证明威尔逊是在德美冲突发生后而不是之前把德国称作“独裁国”的话,那么这种命题(民主和平论)也许就站不住脚了。我隐约知道,威尔逊进入政治圈之前曾是一位政治学家,但我对政治学史却知之甚少。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能向一位博学的同事吉姆·法尔(Jim Farr)请教学科史方面不可或缺的知识。吉姆建议,除了众多事件外,我的研究还应包括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这位狂热的亲德派,他创立了美国第一家政治学研究生院。

在我的军备竞赛研究中,我最终推崇数学模式引发洞察力的力量,而其他方法则没有这种明显的效力。当我致力于研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约翰·伯吉斯时,我意识到,尽管历史考察不同于数学推导,但它给了我一种同样的令人振奋的发现感。使我着迷的是,我发现,威尔逊和伯吉斯习惯使用的一些分析分类法和概念后来成了事实上的禁忌[例如,“雅利安”(Aryan)和其他种族分类法],而一些现今普适的概念在一个世纪前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一些概念的当前意义也有别于它们当时的内涵。

尽管我沐浴于现代思维的政治学文化中,但是这一概念的反弹却是一种启示,为批评民主和平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我终于明白,政治学家当前对“民主”的理解部分是由美国的国际敌手所塑造的历史过程的产物。那些使美国看起来像它的敌人的民主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淡忘了。相反,那些夸大美国与其敌人的明显距离的方面却处于有利位置。因此,当我们把当前的民主概念投射到过去时,我们的分析能够确保民主国家间相互和平的科学论断的有效性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民主概念正是这一论点得以“检验”的相同历史范式的产物。我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发表在《国际安全》杂志上,是本书的敲门砖,

它刺激了我更深层地探讨美国政治学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

在我的“历史转型”期,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同事积极支持我新的研究路径,他们甚至引导我对该学科的假定客观性以及它所谓的致力于民主等方面提出苛刻的疑问。其中两位特别值得一提。吉姆·法尔不但是位难得一见的导师,而且是指导和鼓励的源泉。我对吉姆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支持深表敬意。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从一开始就热情支持本研究计划。在课题早期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用更精确和清晰的术语澄清了我的论点。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在我萌发写此书念头之前就建议我这样做。彼得一直亲切地为我提供咨询意见和鼓励。西蒙·赖克(Simon Reich)两次阅读了整个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丹·蒙克(Dan Monk)使我对历史分析的重要哲学内涵大开眼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杰出编辑罗杰·海登(Roger Haydon)自我的设计摆上他的案桌之日起,就一直不知疲倦地料理这一研究计划。罗杰提出要求、建议和观点,并提供资料。没有他的这些帮助,这部书绝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另外,提供过忠告、信息或精神鼓励的人包括(对那些我疏漏的人表示歉意)塔拉克·巴克韦(Tarak Barkawi)、萨米·巴尔金(Sammy Barkin)、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拉里·多德(Larry Dodd)、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杰夫·埃利(Geoff Eley)、玛丽亚·范妮斯(Maria Fanis)、詹姆斯·费斯勒(James Fesler)、佩吉·科恩(Peggy Kohn)、弗里德里克·克拉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马克·拉菲(Mark Laffey)、杰夫·勒格罗(Jeff Legro)、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

mer)、约翰·欧文(John Owen)、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路易斯·E. 罗宾斯(Louise E. Robbins)、布雷恩·施米特(Brain Schmidt)、罗杰斯·M. 史密斯(Rogers M. Smith)、乔·昂德希尔·卡迪(Joe Underhill-Cady)、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以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本书的早期研究得到了来自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变换世界中的和平与安全麦克阿瑟基金会博士后流动人员”奖学金的资助,另外还得到了佛罗里达大学文科学院人文学术促进基金的资助。

第一章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国际安全》第20卷(1995年秋季)第147—184页,第四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第6卷(2000年12月)第543—573页。我感谢这些期刊的出版商麻省理工学院(MIT)出版社和塞奇(Sage)出版社允许我在这里翻印这些资料。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和戴维·伊斯顿非常友好地允许我引用他们存档于肯塔基大学图书馆的口述史资料。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的遗嘱保管人迈克尔·赖斯曼(Michael Reisman)允准我发表存档于耶鲁大学的拉斯韦尔论文资料。我还按照一些图书馆的规定使用了下列档案文件集:卡尔·弗里德里克(Karl J. Friedrich)文件集、布鲁斯·坎贝尔·霍珀(Bruce Campbell Hopper)文件集(都来自哈佛大学档案)、詹姆斯·费斯勒(James W. Fesler)文件集(耶鲁大学图书馆)、詹姆斯·波洛克(James K. Pollock)文件集(密歇根大学本特利文史馆)以及赫伯特·施奈德(Herbert W. Schneider)文件集(哥伦比亚大学珍稀书稿图书馆)。

本书的出版给了我答谢两位导师的机会,他们极大地增长了我的知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史学系的格肖尼(Gers-

honi)指导了我的论文,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他教育我:一名学者意味着什么。随着我本人成为一名学者,我越来越欣赏这一典范。我的学位论文导师克里斯·阿肯(Chris Achen)既把我看成学生又当作同事。他教导我拓宽理论视野,批判性地思考和严密的分析。

我的父母米里亚姆和平彻斯·奥伦(Pinchas Oren)向我灌输学问的价值,他们对我的智商一直非常自信,尽管我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事业奉献给他们。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母亲正遭受癌症的折磨。要是她看到本书的付梓,我该有多骄傲,我谨以此书纪念她。我最应感谢乔迪(Jodi),没有她的关爱和支持,就没有这部书的问世,更不用说有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阿维格爾(Avigail)、梅阿(Maya)和艾頓·奧倫(Eytan Oren)。

伊多·奥伦

于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英文版前言	4
导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政治学	1
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19
知识关联:建构主义、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社会学	24
第一章 德意志帝国	36
约翰·伯吉斯的民族主义理论	41
伍德罗·威尔逊的中央集权理论	49
德美冲突的后果	61
第二章 纳粹德国	76
“犹太种族的最恶劣代表”	79
德国政府的诉求	86
对希特勒“最开明的评论”	122
与纳粹主义碰撞的影响	126
第三章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142
极权主义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政治学	142
两次大战期间的妥协主义者形象	151
程式式民主的胜利	184

第四章 冷战政治	199
公共行政与发展中国家	200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双重生涯	210
白鲁恂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225
艾弗隆·柯克帕特里克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会	236
越战的影响	248
结论 走向沉思的政治学	275
译后记	290

第四章 冷战政治	199
公共行政与发展中国家	200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双重生涯	210
白鲁恂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	225
艾弗隆·柯克帕特里克的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会	236
越战的影响	248
结论 走向沉思的政治学	275
译后记	290

导论 作为意识形态 的美国政治学

美国政治学家很少反省其学科的身份(identity)。他们本能地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宛如他们的讲道代表一门客观科学的戒律。因此,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形象(self-image)出现了一种悖论:一门独立的科学附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

业内人士认为,政治学与自由民主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除了例行公事如美国政治学会(APSA)主席的年度发言中提及这一主题外,二者的关系几乎无需赘述。例如,哈佛大学政府学伊顿(Eaton)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该学会1987年的年会致辞中说,“没有政治参与就不可能有政治学家”;“民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紧密相连”。他强调:“哪里的民主强大,哪里的政治学就强大;哪里的民主弱小,哪里的政治学就弱小。”并进一步指出:“二者的关系再没有比二战前的德国和意大利更一目了然的了,这些国家在历史、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方面有独立的学术传统,在政治学上却没有这种传统。”¹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观点,我们不免对政治学与民主之间这种所谓牢不可破的联系产生怀疑。亨廷顿文章的主要思想是,民主改革应该缓慢、逐步和非常谨慎地实施,不能对独裁国家通

得太厉害,因为“一个现行的邪恶政体不管多么恶劣,总是有可能而且经常会出现更邪恶的政体:看看古巴、越南和柬埔寨的不幸经历就可想而知……因而,政治学家只能怀疑像智利一名持不同政见者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提出的一种观点,‘我们再也看不到比皮诺切特将军更坏的了’,或者怀疑一位反种族隔离制人士的观点,‘南非第一届非洲人政府……绝对不比当前的政权更坏了’”。比它更坏的情况明显是“由非洲国民大会革命者”领导的政府。²

亨廷顿提及南非并非偶然。数年前,他到约翰内斯堡会见了南非官员,并在南非政治学会做了一次关于政治改革的演讲。³他这次南非之行的背景是,该种族隔离政权试图对宪章进行有限的修订,让该国的混合种族和亚洲人种享有某些权利,而把黑人排除在外。20世纪80年代早期担任《纽约时报》驻南非记者(后来为该报的主编)的约瑟夫·莱利维尔德(Joseph Lelyveld)关于此次努力所做的评论值得长篇引述,因为它一方面为思考政治学与民主的关系提供了佐证,另一方面预示着我下文的研究途径:

由美国政治家发明并适应此类种族革新方法的行话,总是不可思议地引人注目……,手握统治权的国家政党现在能端起一面镜子对着自己,发现它有希望成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Rotberg)所说的“改革寡头政治的样板”。像“限度”(parameter)和“合法性”(legitimacy)之类的术语如同冰镇威士忌饮料中的外来水果片一样,在白人政治家和官员的谈话中传诵。南非斯特伦伯什市(Stellenbosch)一位教授告诉我,该政党努力策划“范式转变”(paradigm switch)。第一份关于宪法修改的主要文件,即由被称作“总统委员会”(President Council)的